

绪论

苏葆立

作者为职业情报分析家,从事情报分析工作长达二十四年,1989年至1994年,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国家情报官,1997年至1998年,担任主管东亚事务的国家情报官,1994年至1997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事务部主任.曾著有*天安门事件之后:有关美中关系的政治,1989-2000*,由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出版.

本汇编收录了有关中国的销密国家情报评估与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共三十七份,包括存有七十一份相关文件的只读光盘一张.为研究美国政府情报工作与政策提供了一份备受欢迎的补充资料.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研究中心所编纂的其他优秀汇编,如*观熊: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分析文章(2003)*,*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分析,1947-1991(2001)*,*冷战结束之际:美国有关苏联与东欧的情报,1989-91(1999)*,和*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评估:成绩相对于指责(1996)*(注1),与本集一道将为对情报作业程序,任务执行情况,与其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些文件在美国政府领导人与官员制定有关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1949年后成立的和在毛泽东(注2)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人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件作为原始资料对于我们目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其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所进行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有关苏联的汇编是对垮掉了的苏联和已结束的冷战进行回顾,而这些文件却体现了对一个现实存在的国家正在成形的思维,这个国家正在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件构成一件在制品的部分基石,有关五十年前共产党领导层问题的文件仍然有助于了解当今北京领导层更替与权力交接问题.有关五十年代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在当今紧张的海峡两岸关系中有其针对性,而美国则被卷入中国内战余留下来的问题之中.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回声在目前所进行的旨在解决美国与北韩因后者的核计划而产生紧张关系的六方会谈可以听得到.中国的经济目前是最强大的经济之一,它很明显是经过艰苦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后而产生的,本汇编将对其进行探讨.

有关评估的问题

在对这些文件与其重要意义作详细的阐述之前,必须指出,除了一小部分的文件外,所有其他被收录到本汇编的文件当初是以国家情报评估或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的形式印行的.评估不同于其他情报报告,这些报告注重现况情报,而评估则着眼于未来,美国现代情报系统是1947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的产物,而情报评估在美国现代情报系统建立的最初时期就被认为是中央情报主任,经过美国政府其他情报机构的同意,所运用的对国家有重要影响的具体问题与国家危机情况之最佳分析,正如中央情报主任沃尔特贝德儿史密斯在1950年举行的情报咨询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

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应该由一个机构统一汇集和编制,而这个机构的客观性和无偏见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份评估最终由各情报机构最高领导官员作出集体论断后通过...它应该在所有政府部门作为可以获得的最佳评估,而且可能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估而受到承认与尊敬.在该条法律下,中央情报局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汇集和制作协调一致和具有权威性的评估(注3).

因此,起草评估的责任短暂地交给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与评估办公室后,于1950年十一月,转交给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办公室,该办公室充分履行其评估任务,准备了一千五百余份情报评估,直到它在1973年十一月解散为止(注4).该办公室是一个小规模机构,设有由五到十二名高级专家组成的国家评估委员会,并雇用二十五到三十名具有地区与职务专长的专业人员以及后勤职工(注5).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情报部(下面所讨论的国家对外情报部的前身)任何成员,或国家评估办公室领导本身可以要求(下达任务)进行评估.评估过程平均为六到八周,国家评估办公室完成评估后,由中央情报主任提交美国情报部每周一次的会议取得最后同意.届时,如个别部门对评估里的论断提出具体异议,将对其进行讨论,并记录和记载于最后的草稿中.评估的最后稿件由国家评估办公室,根据机密级别,评估议题,以及针对性传送到美国政府内的一百至三百个人员或办公室.许多评估经过发表后,还接受正式的复核以便情报搜集人员对“情报缺欠”或信息不足加以纠正(注6).

为了更好地满足对情报的需求和更好地使情报界人员(注7)参加起草评估性的情报,国家评估办公室于1973年由国家情报官接替.1979年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注8)由这批具有实质性知识的专家组成.本集汇编中由国家情报官系统主持下编制的只有两份文件,而全部汇编中只有三份文件是由国家情报官系统主持下编制的,国家对外情报部目前负有对国家情报评估予以最后批准的责任,该部由中央情报主任或副主任主持,并由美国政府主要情报搜集与分析部门的领导人组成(注9).

情报评估至今仍引起争论. 这些评估虽然有其争议性, 但它们未必是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最关键性的组成部分, 再者, 正如薛曼肯特说, 当你对某事情没有准确的了解或没有把握时, 你会对它进行评估. 在讨论重大或复杂的议题时, 正式的情报评估有必要在臆测的范畴内进行钻研, 这是一个繁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 从不可能的事情中筛选出可能的事情, 再从可能的事情中筛选出很可能的事情, 以及对重要难题提供答案, 而这答案是由于缺乏完整的信息而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本人任职于美国政府长达二十四年, 既是情报评估的生产者, 又是情报评估的消费者(注10). 本人可以证实这些评估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若评估是因为主要决策者具体要求或针对正在发生的危机而编写的, 则它们很可能被兴致勃勃地阅读, 而且成为危机处理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若评估非常专业化和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则将被仔细阅读, 而且将被纳入长期规划过程中, 这对军事情报消费者而言, 更是如此. 若评估是对国内政治, 经济发展, 甚至外交政策的综述, 则它们不太可能被主要决策者阅读, 而是非常有助于对中级官员和情报界其他人员就一般政策问题和决策制定者面临的(始终是逼近的)潜在问题进行教育.

总之, 肯特给为评估作准备的人员的忠告仍然是正确的. 他说, 一份评估

... 应该在我们评估权限内有其针对性, 尤其应该具有可靠性. 如果我们作决策的主人, 无视我们的知识与智慧, 他如此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准确, 不完整, 或者有明显的偏见, 而是因为他需要更注意别人的话. 要让他因为决定听从别人的话而感到不安, 而且是十足的不安(注11).

本人认为, 同样重要的是, 国家情报评估是记录文件, 为建制史, 也许亦为国家历史, 作出贡献. 现况情报分析很快就消失, 而且比昨天的报纸消失的更彻底. 中程分析往往是因为错误才被记住. 但是评估记载着重要论断, 代表着数百名情报分析家的集体学识, 而且准备经受时间的考验,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经得住两年到五年的时间考验. 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是为历史学家与决策者编写的.

国内政治—毛年代

在考虑如何将本汇编所收录的大量的分析文献进行划分和予以评论, 本人认为应该采取某些评估本身的总体结构, 尤其是综述性的评估, 如编号为NIE13-58和NIE13-60, 标题均为 *中共*

的评估. 这样做会很有助益. 这些评估通常所采用的分析方式是先评论党内领导状况, 进而评论经济事务, 包括造成群众不满的根源, 军事力量, 外交政策, 最后以对未来展望作结论. 本人将按照这个模式, 将情报评估员对中国国内政治环境, 经济发展, 军事力量, 以及最后对其外交事务, 尤其是中苏关系和台湾问题, 所作的评估加以讨论.

非从事情报事业的人员经常认为情报分析家有独特的信息来源, 如机密资料, 秘密报告等. 因此认为他们的评估应该是更有见解的, 准确的, 和有预测性的. 换言之, 应该是更为确实的. 从本汇编所收录的文件看, 几乎可以肯定, 相对于学者和记者, 情报分析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运作进行了解时所占的优势并不多, 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是如此. 从1951年编制的首篇有关1949年后的中共之评估, 即编号为NIE10, 题为 *中共* 的评估开始, 评估员就斩钉截铁地作出有关领导层的论断, 而这论断在以后十年内没有动摇, 论断称:

在可见的未来, 中共政权很有可能对中国大陆维持绝对的控制权. 虽然在中国对共产政权的确存在许多不满的情绪, 但这政权享有一定程度的支持或默认, 而且正在采取强硬的治安管理措施.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共产政权内有严重的分裂(注12).

三年以后, 一份于1954年六月发行, 编号为NIE13-54, 题为 *中共到1957年的潜在权力* 的更为全面之评估称, 虽然在二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迹象显示毛泽东领导的领导班子里存在“分歧与对抗”, 但没有“明确建立起来的派系,” 而领导层被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性.”事实上, 该全会主导了党的第一次重大清算, 清算的对象是政治局委员高岗和组织部长饶漱石, 然而有关消息一年以后才为外人所知.

早期缺乏铁一般消息来源并不稀奇. 美国与中国当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商业制裁将商业来往减少到最低限度, 朝鲜战争以后极端的敌视意识形态贯穿着双边关系, 台湾方面的信息不被认为准确或可靠,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组织了非常有效的宣传与新闻管制作业以便严守有关内部政治和政策讨论的机密. 泰伟斯在1979年对文化革命期间公布的党的文献与其他资料进行广泛研究后, 对有关高岗的清算的原因和结果仍表示费解(注13).

到了1960年, 有更多证据表明对党的高层存在不满的情绪, 编号为NIE13-60的评估认为在1959年对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其他人员展开的清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置

疑党的政策(注14).”

但评估的总体论断是，由于毛拥有权力和支持根基，他的意见在党委会占优势，“在他有生之年党派主义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注14).”三年以后，另一份编号为NIE13-

63, 题为*中共的问题与前景*

的评估称，虽然该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联停止援助造成“严重”的损害和进一步削弱群众对它的支持，毛和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领导党的核心分子一道仍保持“最终权力.”

虽然评估员对派别主义会成为问题保持怀疑的态度，但评估对毛与他的同僚表示基于“寿命估算”的关注，因为他们大部分已经六十多岁，有的年龄更大(注16).

题为*中共的政治问题与前景*, 编号为NIE13-7-

65的评估代表某种程度的转折点，它是本汇编中最令人瞩目的文件. 该文件发表极为悲观的看法，重点讨论了有关政治与经济失策的证据，低层党员士气低落，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加剧和对知识分子加大攻击，以及“日益僵化和独断的”最高领导层. 毛被描述为“不安和多疑，”

对批评敏感，和越来越把个人忠诚置于一切之上. 他“倾向于回想当年担游击队队长的日子，以便寻求解决当今问题的办法.”

评估的作者相信这种作法会产生更不切实际的政策. 然而，这份评估又一次准确地表示，派别主义虽然可能存在，但还没有严重到“打破领导人长期运作的纪律(注17).”

九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由毛煽动发起的运动是针对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和他的同夥而展开的，他们被指控不忠，试图恢复资本主义，和实行党派主义. 继而发生的是长达十年的混乱和动乱，这场政治斗争给中国社会稳定，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造成巨大的损害. 起初研究中国的学生与分析家对这些明显的自我毁灭性的政策和行动发生意见不和. 两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家于1967-68年在*中国季刊*

发表文章，对这场闹哄哄而日益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发表截然不同的意见(注18).

文化革命造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被刊登在中国各报刊. 为了谴责和清算党的元老提供依据，红卫兵与文革小组的激进分子发表言论，攻讦性报道，文章，和其他相当程度上阐明党史早期的资料. 为了跟上事态的发展，国外广播资讯服务处，联合刊物研究服务处，和香港领事馆的中国大陆报刊查阅处翻译和发行特辑，这些特辑成为情报分析家与学术界专家的宝库(注19). 在某些方面，专家们所掌握的信息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评估工作并不因此变得更加容易. 题为*中国文化革命*, 编号为NIE13-7-

67的评估采取仔细和平衡的态度对互相矛盾的信息进行了解. 它对预测结果进程中固有的未知因素与风险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政治危机继续进展，它不会即将结束，在它可能产生

的几种结果中,没有一个结果比其他的结果有更明显的可能性。(注20).”

该文件作出有预言性的评估,表示国内战争发生或国家分裂成不同地区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军中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集团会倾向于和后毛时代的温和派政治领导人寻找共同点.并对运动的方向作出慎重而适当的结论.

局势很可能在更偏激的措施和巩固或撤退的时段间摇摆不定.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所要采取的策略或在最高层的受害者.但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认为只要毛能够掌握政治指挥权,中国的局势很可能会紧张和基本上不稳定(注21).

评估员预料毛以后,会有“混乱和有争议的”为接替权力而展开的斗争.然后毛的“失去信用”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会逐渐被放弃.军方和文人领导将试图寻找共同点和恢复可能有助于“取得适度经济增长”的政策(注22).评估起草者并不知道毛会再活九年.

不幸的是,本汇编只提供若干对中国领导层情况进行有说服力分析的例子.编号为NIE13-9-68的评估在衡量文化革命对毛和他的追随者所造成的影响时,再次研究毛所遭到的反对以及在中国的权力工具.题为*中国军事政策与多功能部队*,编号为NIE13-3-72的评估相当详尽地讨论了国防部长林彪被清算后军队内部的政治动乱.林彪是后来被控企图向毛策划政变(注23).但那精心编造的故事至今仍然是个谜.在进行评估时故事还没有编造完毕.评估是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与能力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因此这些文件对文化革命后期没有进行讨论.而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刚成立的国家情报员系统(于1973年成立)还没有制定和国家情报办公室可以相提并论的研究或分析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计划.也许在美中友谊与关系正在发展的时期,没有必要对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作出悲观的评估.可是说也奇怪,毛时代的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

然而所取得的成绩却给人深刻的印象.当然事后总是从评估性的资料中找到错误和失误.但评估的基本论点始终是正确的.在那段时期,国家情报评估的起草者了解中国历史,对苏联式的政治局体制有深刻的了解,并且掌握日益增加的有关北京政府人士与政策的信息.他们的论断是非常笼统,主要讨论“中共”(注24)对美国的利益所造成的威胁,尤其在亚洲.但是论断是客观的,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平衡的,至少本人是如此认为.评估作出的一条更重要的,始终准确的论断是,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所掌握的权力自1948年以来始终没有受到挑战,毛也从来没有在党内受到真正的挑战.他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造成大跃进的灾害,但国家评估办公室的分析家当初低估了大跃进对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雄心勃勃的计划和宣传导致与苏联分裂,而他猜疑和多疑的性格在文化革命中几乎毁灭了共产党,但他的领导地位从来没有受到怀疑.即使今天,毛的声望在共产党内是不容置疑的.

衡量中国的经济

朝鲜战争停战后,当“中共”作为一个国家存续的可能性被确定时,这集汇编中的文件明确表示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与效益进行评估,作为对中国的整体运作与前景进行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评估,如编号为ORE89-49,题为*关于中共的粮食展望*和编号为NIE10,题为*中共*的评估,意识色彩浓厚而且显然不准确.这些评估只研究经济问题对政权存续造成的妨碍,甚至警告不要企图利用这些问题暗中破坏新的共产政府.编号为NIE13-54,题为*中共到1957年的潜在权力*的评估制定人员试图评估和衡量中国的经济效益,并尝试制定让人能够了解的统计标准.但这方面的努力由于中国的经济统计制度发展滞后而受到阻碍.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57)的对象到1955年才宣布,而且之后还不断地修改.

评估员对当时他们对中国的初步经济计划所能了解的情况进行估计.发现该计划仿效苏联模式,从而作出相应的结论.

对增加工业产量重视,尤其是重工业与交通业,该政权的计划之实现有赖于增加农业产量,同时严格抑制消费,为支持对工业的投入和进行军事项目提供必要的资源.大部分为实现计划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从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获得的,以中国向那些国家出口为交换.

评估的起草者充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认为该政权在重建被国内战争,社会动乱,和数十年管理不善破坏了的的经济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们还说,中国严重缺乏经济经营与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过渡集中精力于开销庞大的军工生产,而且人口快速增长,这些将限制中国的增长.然而评估还是作出结论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总产量很可能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注25).

下一篇有关中国经济效益的分析文件刊登在编号为NIE13-58,题为*中共*的评估.这份文件附有长达五页的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附件,对中央预算支出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主要经济部门的增长率进行评估.评估总体上是乐观的,它谨慎而精细地认定中国有能力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所确定的宏伟目标,虽然实现这些目标很困难而且有赖于若干

非经济变数. 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总体增长率与农业生产增长之间的极小的差距. 评估在脚注中加以警告说:

这份评估里的数据与分析是基于中共方面的统计, 评估对这些统计数据持保留态度. 正如对其他集团国家一样, 而且是更有所保留, 这是由于刚成立的对中共进行搜集统计数据的系统缺乏经验...

中共的统计数据是该政权制定计划的基础, 我们相信一般而言是不会被歪曲的(注26).

现在看来, 当时评估所作的经济预测是有实质性的错误. 中国的经济在以后的两年受到灾难性的挫折, 虽然评估里的分析是运用健全的方法和利用现有的数据诚心诚意地对未来效益进行估计, 但评估起草者低估了毛对经济计划和生产体系的政治干预. 虽然他们把统计误差加以考虑, 但他们不可能料想到“大跃进”刚开始生产数据就被大规模和故意地扭曲. 这方面的失误不仅限于他们, 不但西方学术界的专家, 而且整个中国经济计划体系显得迷惑和不了解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经济问题.

到1963年, 外界加深了对该政权经济痛楚的了解, 即使对其背后的政治斗争不清楚. 编号为NIE13-63, 题为*中共的问题与前景*

的评估对大跃进和其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严厉的评析指出:“过去五年, 中共的经济管理严重失当, 领导层缺乏经济方面的训练和经验, 受狭隘的教条局限, 被狂热主义引入歧途(注27).”

评估认为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害是因为苏联和中国决裂以后停止向中国提供援助和专业指导(参阅以下讨论). 该文件还附有长篇附件对中国在1962年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 该分析基于非从中国获得的统计数据 and 中央情报局的内部估算进行非常笼统的产业评估. 它不排除经济继续复苏的可能性, 认为该政权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农业生产和继续“执行比较温和与合理的政策, 如果在天气方面有适当的运气,”

则可能恢复1957年所取得的总体生产力水平. 不过评估也警告说, 由于成功和失败之间, 犹如薄纸一隔, 有关中国经济前景的估计只能是“笼统而暂时性的(注28).”

中国经济问题仍然是以后三年评估的重点. 国家评估办公室的分析家发现他们对最坏情况的假设正成为事实. 编号为NIE13-5-67, 题为*中共的经济展望*

暗示对中国继续不能发挥其经济潜力的失望. 该评估表示:

今年的经济效益似乎毫无疑问有所下降, 不过对下降的幅度不可能进行量化... 自从1960年, 北京很少公布有助益的数据. 在经济计划暂时被搁置的情况下, 重大经济措施很可能推迟到对政治斗争取得某种程度的解决后才出台.

尽管如此, 评估研判中国正在努力使基本经济生产免遭文化革命最严重的破坏. 经济危机似乎不会即将发生(注29).

国家情报分析汇编没有列举重点经济分析的例子. 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组织性的, 中央情报局情报处于1966年设立经济研究办公室, 承担对中国经济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 发展先进技术与模式来弥补官方经济统计数据不足. 以及主要通过国家评估办公室以外的其他管道报告其研究结果的任务. 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后十年中国经济情况继续摇晃不定, 决策圈的兴趣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 这些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战略性武器计划以及它对苏联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过去二十年, 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起飞”和重要的国际地位, 这些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变化, 难以想象当时中国是如何从这些评估所描写的疮痍满目的经济废墟中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部分的人口仍然居住在远离海岸的农村, 他们的经济情况可能与这些评估所描绘的状况没有根本的不同. 农业生产仍滞后于工业发展, 农业富余人口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农村群众的不满继续对政治领导层构成挑战. 这些是评估所描写的事态的重演. 虽然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管理人员, 但一些旧问题仍然存在.

军事挑战与中国战略性武器计划

本汇编所收录的评估中很少没有考虑到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一支有效的战斗

部队, 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 一些评估甚至进行这方面的专门讨论, 人民解放军早期被称为“中国共军.” 尽管这些文件表示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 认为中国的武力值得重视与关注的观念在全集中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关注以有趣的方式呈现变化.

- 编号为ORE77-48的评估在1948年叙述国民党在国内战争遭受令人震惊的战败时, 评述道:“中国共军的力量与战术方面的成功是共产党崛起的主要工具, 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注30)”

- 另外一份评估在中国于1950年加入朝鲜战争前夕写道：“我们相信中国共军能够停止联合国部队往北的推进，他们根据可预见的联合国部队的集结，零星地投入部队，他们也能够猛烈攻击迫使联合国部队进一步往南撤退(注31).”
- 编号为NIE13-54的评估在1954年写道：“共产政权所享有的内部控制与国际上的权力地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军队的潜在权力，而这支军队目前是亚洲国家中最大的部队(注32).”
- 编号为SNIE100-9-58评估在1958年的金门和马祖危机期间警告说：“如果只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反击，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将台湾海峡不让给国民党空军，堵截向外岛的补给，或者攻占这些外岛(注33).”
- 在评析中国在六十年代试验裂变和聚变武器后的战略野心，编号为NIE13-8-67的评估写道：“当前的领导人可能相信，如果成功地发展战略性武器，他们的声望就会大大提高，他们在亚洲的领导权与大国地位将增强... 中国可能相信能够以核武器攻击美国与其在亚洲的目标可以限制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可以将对抗维持在常规武器层面上，因为中国在这方面享有许多优势(注34).”

本汇编里的几篇文件所发表的意见是有关北京政权依赖和投入大量经济资源发展其军队的评估的引申，这些意见认为北京领导人谨防冒险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无论是战略性或常规性对抗，这可能一部分是朝鲜战争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毛投入大量部队与美国部队进行常规战争，

但仍然遭受惨重的伤亡，而且因此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即延续至今的充满紧张的停战。这方面的不愿意也可能是因为1954年和1955年发生的金门和马祖危机，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威胁道，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国民党控制的金门或马祖外岛，美国将对大陆目标使用战术性核武器(注35)。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的谨慎源于毛自己的军事学说，该学说强调“人民战争”以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以及对占军事优势的美国敌军采取慎重的态度。编号为NIE13-3-67的评估扼要地指出：

虽然在中国境外威胁使用和实际使用武力构成北京的观点之组成部分，但中国军事策略的主要重点是防卫。可能除了涉及核武器或导弹的活动外，我们没有看见意味着更有前

瞻性的策略的综合计划,兵力发展或部署,或学说方面的讨论.至少在短期内,中国可能视优先发展核计划主要为达成其威慑目的而进行... (注36).

两份有关中国对越南战争的反应和卷入越战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与三份有关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明确地表示评估员确信他们有关中国不会冒险与美国公开对抗的分析是准确的.比如,在1966年,美国空军扩编和加大对在河内与海防附近的北越目标进行轰炸后,国家评估办公室被要求对中国更积极卷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进行评估.编号为SNIE13-

66的评估称:“就目前美国对北越的军事行动的层次看,我们继续相信中国不会投入其陆军或空军部队与美国持续作战.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国或北越都不认为目前局势已到需要外部介入的危急地步,外部介入会带来扩大战争的危险,最终带来核战争的威胁... (注37).”他们相信中国会继续帮助北越抵抗美国的军事压力,包括部署部分支援部队,但不会像在朝鲜那样,参与战争.

同样在台湾海峡,1958年五月的基线推断认为只要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中国“不会使用军事行动攻占台湾(注38).”不过推断没有排除中国可能对外岛采取“更有侵略性”的态度.当人民解放军在金门对岸的炮兵部队在1959年八月下旬开始猛烈炮击该岛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对中共的意图进行评估.编号为SNIE100-9-

58的评估重申炮击行动的目的是要试探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意图.虽然中国的武装力量有能力攻击外岛,但“很可能因为怕美国干预而不敢冒动(注39).”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提高赌注宣称会堵截国民党对金门卫戍部队进行补给和向在其领海的舰船开火时,我方准备了另一份评估.这份编号为SNIE100-11-

58的评估留有余地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越来越愿意冒险与美国进行战争.评估预测,如华府选择使用美国海军向该外岛进行补给或护卫国民党舰船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中国“可能袭击美国部队.”

然而评估员重申中国或苏联似乎没有正在为大规模的冲突进行准备(注40).总统艾森豪选择使用美国海军护卫国民党补给舰到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三英里以外之处.同时再威胁如果战争扩大,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队进行核攻击.在华沙重开与中国的外交谈判.十月初,中国停止炮击一个星期,让补给不受干扰地进行,危机因此逐渐缓和.于1958年十月下旬和1959年二月发表的后续特别国家情报评估重申有关中国在美国决心保卫外岛面前退让的论点.

回顾过去,中国在台湾海峡不能反击美国常规或核能力,而且苏联在危机期间很明显不愿意支持它的中国盟友(评估指出这一点),这无疑导致中苏的紧张关系,使中国决定加快发展其

战略性武器计划. 该计划1960年后成为评估员日益关注的重点问题, 1962年到1974年间, 他们编写十三份有关这问题的评估. 日益先进的情报搜集计划, 尤其在六十年代开始可供使用的卫星图像技术, 有助于从事有关中国计划的人员获得更多对中国的知识. 由于这些计划的性质和它们与当今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继续有关系, 大部分有关中国发展核计划的文件都被大量修改.

阅读被大量修改过的文件是令人有挫折感的过程, 不会让人对中国的核武器或战略导弹计划的性质产生许多独特的见解. 不过被修改过的文件表明这些计划在美国与苏联产生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也表明基于一些照片和其他不足够的线索对一个国家的核能力进行评估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更何况对它的核意向进行评估. 国家评估办公室的评估员在编号为NIE13-2-

60(注41)的首份有关中国战略性武器计划的重大评估中, 研判第一个核爆炸很可能在1963年进行, 也可能在1964年或1962年进行, 这有赖于苏联的援助. 另一方面, 于1964年八月下旬发布的, 编号为SNIE13-4-64, 题为*中共即将进行核爆炸的可能性*的评估指出在罗布泊的试验场明显地已经准备就绪, 同时指出很少迹象显示有足够的可裂变物质可供制造炸弹, 在年底之前不可能完成试验. 然而试验在1964年十月十六日进行.

中国核计划的发展速度始终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 在进行首次大气层中的试验两年后, 中国宣布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 而且于1967年六月, 首次进行热核武器试验. 这些惊人的进展是在中国经济相当疲弱和政治制度因文化革命日趋混乱的背景下取得的.

整个社会的动乱似乎未殃及中国的战略性武器计划, 这给编写编号为NIE13-8-67, 题为*中共的战略性武器计划*

的评估的起草者深深地感觉到计划背后的决心. 但是发展速度给评估员留下“极少有关中国对核武器在整体战略中地位的思维方面的证据(注42).”

他们似乎不相信中国将试图在战略计划的规模或毁灭性方面争取与美国或苏联势均力敌, 并指出在技术和保障方面持续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 他们作出结论说, 中国的计划“在未来十年内, 将由于中国在工业, 技术, 与人才方面的薄弱, 受到有关范围, 质量, 和数量方面的限制(注43).”

然而该计划却令人担忧, 尤其对苏联而言, 当时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处于非常激进的阶段. 在六十年代, 中苏争端演变成公开的敌视和仇恨, 于1969年, 终于演变成武装冲突. 在该场冲突中, 中国与苏联的部队在其边界多处进行激战. 编号为NIE11/13-

69, 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国*

的评估揣测说, 有迹象显示苏联领导层正在考虑和准备与中国进行一场军事决战. 这样做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利用其空中优势破坏中国的核设施与导弹设施, 同时阻止中国使用其战区部队展开地面上的报复性攻击(注44).”

评估员认为莫斯科不太可能实现它的目标, 而且认为这样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不过他

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最后由于比较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 争端有所缓和, 但是中国的战略性武器的重要性和弱点成为随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评估的主要因素.

到1974年, 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官系统编写一篇评估对中国战略计划的意向和范围作出稍微更坚定的论断. 由于政治, 经济, 和技术方面的约束, 计划被认为已经减速, 而转为旨在发展“对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美国大陆进行袭击的象征性核能力(注45).”

计划被认为不是不惜任何代价, 仓促和轻率地发展战略性武器, 而是体现(在林彪被清算后)军队被制服了的国内政治现实, 以及对国际局势不认为那么令人不安的看法, 这种看法是来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威胁减轻和与美国的关系改善的结果. 中国被认为拥有130枚导弹和可以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 而且被预料在十年内会拥有六枚能够瞄准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一些潜艇发射的导弹(注46).

中国的军事能力, 包括其战略性武器计划, 仍然是美国政府决策者极为关注的议题. 在某些方面, 这汇编所收录的最后一份评估编写将近三十年以来, 中美战略关系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中国维持可靠的小规模核部队, 这支部队经得住第一袭击, 配备着一整套的能够击中美国在亚洲的基地或盟国的导弹, 以及少数有足够射程袭击美国大陆的武器. 美中关系的性质向好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 主要是因为这些评估所探讨的中国外交政策上的变化. 不过很少人会认为有理由放松或停止对人民解放军和它的常规和战略能力进行了解的努力.

在美国眼里的中苏关系

本汇编所收录的最早的文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政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被认为对美国的利益有害. 编号为ORE45-

48的评估考虑到1948年七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地位岌岌可危, 便推断国民党会垮台和被“即使不受控于苏联也将受苏联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取代. 评估认为这将是越来越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注47).”

六个月以后, 共军在济南, 锦州, 沈阳, 与其他重要城市击败国民党部队, 评估员对事态的后果再也不怀疑了. 他们推断“没有具有实际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可以持续抵抗. 至于中国共产党, 他们写道:

它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共同的政治组织, 以及共同的战略与策略, 就目前而言, 它们还有共同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开偏离苏联党的路线

,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苏联的任何行动或代表,从来没有表示可能将其导向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转向美国.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仍然是苏联政策的工具.*

没有“分裂的可能性,”至少就目前而言(注48).

在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后,将中国与苏联的制度,政策,和利益等同起来是完全有道理的.北京在其政治结构,作法,与政策上非常明确地表示它对莫斯科的忠诚.于1950年二月签署的友谊,同盟,互助条约将两国联系在看似强大的国防协定之下.中国在1950年加入朝鲜战争被认为是苏联授意的.

然而注意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中是否出现分裂或紧张的迹象始终成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整个苏联集团进行评估的人员的工作主题,他们与学术界的观察家在这方面有共同的兴趣.事后回顾当时的情况,让人很想对他们作个比较,看他们之间谁首先对事情“弄对.”这是效果不特别大的作法.早在1952年,起草编号为NIE58,题为*中共政权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关系*

的评估人员就确定对中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紧张迹象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中国加强控制所进行的努力,它对中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有关划分边界的问题,与在亚洲的其他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以及毛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角色.但他们作出结论说,两国与两党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它们消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的共同目标,超过可能使它们疏远的因素(注49).学术界的专家稍后撰文作出类似的结论(注50).

1956年双边关系开始紧张,赫鲁晓夫在二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中方对此表示不满),紧张的关系随着苏联对毛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设立“公社”的决定表示轻蔑而升级,紧张的关系由于莫斯科在1958年金门和马祖危机爆发时不愿意支持中国和赫鲁晓夫试图与华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达到严重的地步.但是紧张的关系被仍然光泽鲜明的社会主义团结的外表隐藏了一年,到1960年四月才爆发成为公开的争辩(注51).八月份,编号为NIE100-3-60,题为*中苏关系*

的评估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权力声音”之间“纷争急剧上升.”

该文件对中苏日益复杂的关系的各方面进行详尽的研究,并作出结论说:“我们相信中苏关系里的

凝聚力比分化力强大,这种情况至少在这份评估所涵盖的五年内很可能继续存在.”然而即使公开的决裂不可能发生,双方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亦不可能调和(注52).

1960年十一月,莫斯科举办一场重大的共产党国际会议,希望借此使该运动恢复表面的纪律.该会议会期长,且争论不休,最后加剧了中国与苏联政党之间的分裂,但没有导致公开的决裂.次年编写的编号为NIE10-61,题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力与控制*的评估对越来越支离破碎的运动作了总结,评估没有改变一年前所作的论断,这论断认为中苏争端会持续下去,但不一定会恶化.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撤职后,苏联领导人的确似乎试图与中国言归于好.不过大家误判了毛和他将他的意见强加于中国政策的能力,这些政策包括外交政策,毛在他和他国内的敌人间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中,用支持苏联“修正主义”的指控来伤害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并对苏联进行更加恶毒的攻击.

到1966年,国家评估办公室超前地了解到中国动荡不安的国内政治局势会影响它的外交政策.评估员总结当年的双边关系时作出结论说:“只要毛泽东和林彪领导班子保持权力,中苏关系将继续恶化.”虽然评估员认为不可能发生公开的决裂,他们还是写道:

...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争端突然爆发,而以新的,更恶毒的形式体现... 如果中国的权力加强其民族专断性,严重的麻烦可能出现,尤其在边境地区(注53).

三年后,在黑龙江与新疆的中苏边境发生冲突,使双边关系达到最低点.评估员评述说“提出重大的中苏战争会否在短期内爆发的问题是合理的.”

评估员们再次对双方的利益和冲突深化所带来的严重损害性的后果采取平衡的看法,作出结论说中国不会发动战争,苏联可能会考虑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战略性武器设施,但很可能决定不这样做(注54).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会否促使其中一方调整对华府的政策,评估员对此并不乐观.莫斯科可能“在小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但我们不认为苏联目前正在考虑牺牲它至关重要的立场.. 例如,德国的分割和在东欧的苏联圈子的合法性.更不可能的是中国反美立场的重大改变(注55).”

1969年九月十一日,苏联总理科锡金在河内出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返回途中停留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商谈重启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周的态度不明确,据说他向科锡金提出警告说苏联不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九月下旬,中国在罗布泊引爆两个热核爆炸装置,其中一个装置的威力在三百万吨级当量.十月七日,中国同意恢复边界谈判.从而大大地缓和危机(注56).

本汇编有关中苏的最后评估在1973年编写,评估作出结论说:

虽然中苏关系将继续呈现不同程度的紧张,但可能会往紧张缓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战争方向发展.

该文件讨论这两个可能性的展望与含义,指出最大的可能性是不安的和平将延续,战争不会爆发,但也不会有和解.评估再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期望因中苏关系改善或恶化而受益(注57)

有关中苏关系的文件总体上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合理,谨慎的分析,这是跨部门分析的特点,这种分析对可能发生的局面与事情作精细的评估,倾向于预测现状将延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作法对后果作出正确的预测.在所有的情况下,评估在其有助益的摘要中提出证据使决策层的读者了解正在演变中的关系之背景.本人认为这些评估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之处:1)高估了至少在五十年代中意识形态的团结以及共产集团内其他向心力的重要性;2)没有足够有关国内政治对中国外交政策造成影响的证据;3)不能(没有被允许)对美国的政策选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苏联的外交决定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评估.最后的因素不是评估员的过错,是被需要保持情报分析与决策之间严格的界线所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美国的三角关系

由于上面所列举的三个原因中最后一个原因,这些文件,与本集汇编其他方面比较,最不能阐明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评估所涉及的时间长达二十八年,其中美国和中国处于不能消解的敌视关系长达二十五年,双方没有寻求或期望改变这种状况.编号为NIE10的评估在1951年宣称,“中共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破坏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以及削弱美国与其盟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地位(注58).”

该论断在以后二十年保持显著的连贯性.不管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东南亚,朝鲜,日本,或台湾问题,国家评估办公室的评估员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共对美国与其利益和盟国采取敌视的态度.而且认为中国想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力量之战略目标是不言而喻的.编号为NIE13-60的评估称,“中共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在远东称霸.这个原则几乎不会(在未来五年)发生明显的改变(注59).”编号为NIE13-9-65的评估进一步说:

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原因,中国把美国视为它的头号敌人.北平当前的安全利益和其有限的军事力量范围导致它在外交上集中主要精力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地位(注60).

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遭到明显的失败后,编号为NIE13-69的评估(这是一分极佳的对中国外交政策二十年的总结)仍坚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无

论是在北京或台湾,都一致认为中国的正当地位应该通过在亚洲大陆,最终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取得政治主宰权来建立(注61).”

这种看法可能被认为有缺点,因为它显得受意识形态的,冷战式的影响,而且中国领导人关于他们战略目标的谈话很少被引用来作根据.不过现有事实表明这些评估在现实中是有充分根据的.冷战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是遥远和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它是真实的事情.中国在那个时期有关美国的官方谈话与言论很明显是有反抗性的,尖锐的,和富有敌意的,没有妥协的迹象或隐隐约约显示出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事实上,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意愿的评估性分析文章一般都是轻描淡写或至少是低调处理.本汇编所收录的文件有比较高的客观性,即使在讨论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时亦如此.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此.虽然这问题没有经常被提到,本汇编所收录的文件表现出干净利落和客观的一面.这些文件编写的时候并不是无争议的.研究与评估办公室早期的文件尤其在其时代背景下阅读时显得颇有兴味,当时中国国内战争和美国对此的卷入正在以不幸的结局收场.国防部与国务院之间以及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爆发有关中国政策的争论,反共情绪在美国达到狂热的地步.1948年七月,国会通过援助中国法案,该法案追加拨款1.25亿美元让蒋介石政府购买额外武器装备,在国会刚通过该法案后,编号为ORE45-48,题为*中国目前的局势*的评估就发表一则令人丧气的消息说:

当前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岌岌可危,它可能随时会垮台...即使在美国目前的援助计划下,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似乎没有希望扭转或停止走向解体的趋势.由于战争失败和他显然不愿意和不能完成有建设性的改革,蒋介石的权力与声望不断地在下降(注62).

该文件可能为国务院的论点提供了依据,当时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与政策计划主任乔治.凯南赞成限制美国向蒋介石提供更多的援助(注63).这无疑与美国军事评估的论点有出入,这些评估认为更有效地提供美国武器会让国民党支撑下去.

蒋介石夫人于1948年十二月初访问美国请求更多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在她访问前夕,编号为ORE77-48,题为*中共的能力*的评估预言国民党的抵抗将在数月内被粉碎.一旦完成粉碎行动,共军会“从容不迫”地进一步肃清所有地方反抗力量,进而建立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名义上的联合政府.该文件认为共产党展开有效的军事和后勤工作,指出它在其控制的地区推行“适度”的土地改革政策,责备国民党政府不能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注64).当国务院的司务官表现出类似的

客观性时,被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为远东局内同情共产党人的“红色小组。”这方面的争议最后使国务院的几位中国专家失去工作和声望(注65)。

在为本汇编选录评估文件时,编辑人员决定不收录有关蒋介石在1949年于台湾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的讨论.关于五十年代台湾海峡危机的评估被收录是因为它们与北平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希望以后的汇编会收录与1949年后的国民党有关的评估文件.

就我们现有的关于海峡危机的评估而言,国家评估办公室的分析家对所评估的问题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编号为NIE100-9-58,题为*台湾海峡地区可能的事态发展*

的评估揣测说,对外岛恢复进攻部分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对于他们“未能为实现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目标而取得明显的进长,”

未能防止“国际上更广泛地接受实际上存在‘两个中国’的状况,”

以及未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而感到不满,该评估于1958年八月危机高峰时期发布.评估对国民党的目的进行同样坦率的分析,认为它设法保持中华民国政府的威信,使返回大陆的希望之火不熄灭,维持民众的士气,以及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援助和保卫台湾的更坚定的承诺,一些未指名的官员还认为它设法将美国卷入与中共的战争(注66).该评估提出近乎政策建议的结论说,美国如果采取“次要的措施,”

如部署更多的船舰,向台湾提供更多的武器,或提出“一般的警告,”

这不会阻止中国对外岛施加压力.

虽然艾森豪政府明显地不愿意卷入一场为保卫难以防守和无战略价值的外岛进行代价高的战争,虽然莫斯科通过赫鲁晓夫九月十九日的一封信明确地威胁华府说,如果美国向中国使用核武器,

莫斯科将进行核报复,但最后美国还是向台湾和大陆明确地表示其对台湾的承诺.美国和中国都认为莫斯科表示愿意帮助北京的言论是空洞和有条件的.

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后成为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时谈判的中心问题(而且至今仍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但本汇编所收录的评估只是顺便提到这议题.在某些方面,这是因为决策者加强自身的能力,不再认为必须用情报界的文件为自己对中国有关美国的政策的评估提供依据.在某些方面,这反映了整个美中关系的发展.在七十年代中,中国领导人已经不是遥远和模糊不清记忆中的对手,而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和国务卿的对话者,他们相信他们开始了解中国领导人的主张,目的,和意图,甚至比由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小心翼翼的通才组成的委员会了解更深.

尽管如此,本汇编再度提醒我们评估文件对中国与其政策的长远了解具有价值.评估文件将历史评析和总结与时事结合,愿意揣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最佳状态下的评估文件为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路线图.它们阐明当今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环境,背景,和趋势,对这些问题进行预测,以及提供富有经验的专家的观点和论断.它们为情报界人员在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问题上集中注意力和集思广益提供重要机会.纵观过去,它们为希望多了解情报分析,希望多了解美国的决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早期的美中关系的人士提供极为有趣的读物.本人赞扬和感谢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信息管理人员中的编辑人员和销密专家将这独特的文件汇编提供给广大群众.

注释

注1: 这些和其他文件很容易在情报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www.cia.gov/csi/index.html> 取阅.

注2: 当时美国政府使用威妥玛拼音法翻译中文名字,后来改用中国使用的拼音法.在提及中国领导人时,本人将先使用威妥玛法,然后再使用目前的拼音法.

注3: 引自薛曼肯特的*有关国家情报分析的法律与惯例*.

该著作可在<http://www.cia.gov/csi/books/shermankent/5law.html> 查阅.

注4: 同上.本汇编所收录的评估使用的编号体现了这组织历史.研究与分析办公室所编写的评估编有该办公室的名称缩写.编号为NIE和SNIE的评估则由国家评估办公室编制.

注5: 同上.参阅薛曼肯特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的制作过程*.该著作可在<http://www.cia.gov/csi/books/shermankent/making.html> 查阅.这是一篇特别有价值的文章.作者从1952至1967年主管国家评估办公室.该文章详细讨论了国家评估办公室准备评估的全部过程.

注6: 同上.

注7: 情报界目前由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空军,陆军,海岸防卫队,海军陆战队情报处,联邦调查局,本土安全部,能源部,和财政部组成.

注8: 欲获得有关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详细叙述以及了解其组织结构,历史,授权任务,和其制作的一部分作品,可到http://www.cia.gov/nic/NIC_home.html. 查阅.

注9: 该结构是中央情报主任根据1997年一月十四日的3/1命令授权建立的.有关信息可在<http://www.fas.org/irp/offdocs/dcid3-1.html> 查阅.

注10: 参阅刊载于本文开端的简历.

注11: 参阅薛曼肯特的*评估与影响*.

该著作可在<http://www.cia.gov/csi/books/shermankent/4estimates.html> 查阅.

注12: NIE10, 中共,

第一页,1951年一月十七日.所有被引述的国家情报评估与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的页码均为原文的页码.

注13: 泰伟斯, *中国的政治与清算: 整改与党的准则的衰退, 1950-1965*, 第166页, (纽约: M. E. 夏普出版社1979年出版).

注14: NIE13-60, *中共*, 第九页, 1960年十二月六日.

注15: 同上.

注16: NIE13-63, *中共的问题与前景*, 第四页, 1963年五月一日.

注17: NIE13-7-65, *中共的政治问题与前景*, 第三页和第九页, 1965年八月五日.

注18: 参阅刊载于*中国季刊*

第二十九期(1967年一月至三月)第一页到第三十五页, 菲利普. 布里奇哈姆著作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发展*;刊载于*中国季刊*

第三十四期(1968年四月至六月)第六页到第三十七页, 菲利普. 布里奇哈姆著作的*1967年毛的文化革命: 为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以及刊载于*中国季刊*

第三十二期(1967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三页到第三十六页, 查儿斯. 纽豪萨儿著作的*六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 文化革命的序曲*.

注19: 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著作的三卷本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利用该时期公布的大量文献资料编写一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领导层互动的详细历史.

虽然有关文化革命的起源和政治目标的评估仍有争议, 编号为NIE13-7-

67的评估所提出的论据无论作为该动乱时期的准确叙述或与当时的报刊和学术界分析文章相比都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注20: NIE13-7-67, *中国文化革命*, 第一页, 1967年五月二十五日.

注21: 同上, 第十页和十一页.

注22: 同上, 第十二页.

注23: 据后来的报道说, 林是于1971年九月十二日乘坐军用飞机逃往苏联时被杀害. 林的主要助手主导1969年选出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他们和很多其他军官在一次对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清算中被逮捕和撤职.

注24: 这些文件使用意识形态领域的用语, 如“中共”而非“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到六十年代使用国民党所用的“北平,”

这并不意味这些文件有意识形态的偏见. 除了个别例子外, 这些文件对中国的行动和成就作论断时采取谨慎中立和非意识形态的态度. 它们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其目的和做法本质上对美国具有敌意的, 但它们没有体现当时公共范畴里所见到的其他更为极端的看法(用语), 如“红色中国”或“赤共.”

注25: NIE13-54, *中共到1957年的潜在权力*, 第一页, 1954年六月三日.

注26: NIE13-58, *中共*, 第二十二页, 注1, 1958年五月二十三日.

注27: NIE13-63, *中共的问题与前景*, 第五页, 1963年五月一日.

注28: 同上, 第六页.

注29: NIE13-5-67, *中共的经济展望*, 第四页, 1967年六月二十九日.

注30: ORE77-48, *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的能力*, 第一页, 1948年十二月十日.

- 注31: NIE2, *中共对朝鲜的干涉*,
第三页, 1950年十一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面加入战争两周前).
- 注32: NIE13-54, 前引书, 第二页.
- 注33: SNIE100-9-58, *台湾海峡地区可能的事态发展*, 第二页, 1958年八月二十六日.
- 注34: NIE13-8-67, *中共的战略性武器计划*, 第三页, 1967年八月三日.
- 注35: 参阅罗伯特·艾辛奈里的 *危机与承诺: 美国对台政策, 1950-1955*,
(北卡罗来纳, 查普希尔: 北卡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和托马斯·施托尔珀的
中国, 台湾, 与外岛: 一起对外蒙和中苏关系的影响
(纽约, 阿蒙克: M. E. 夏普出版社1985年出版).
- 注36: NIE13-3-67, *中共的军事政策, 总目标, 与防空部队*, 第一页, 1967年四月六日.
- 注37: SNIE13-66, *中共目前对越南局势的意图*, 第五页, 1966年八月四日.
- 注38: NIE13-58, 前引书, 第十九页.
- 注39: SNIE100-9-58, 前引书, 第五页.
- 注40: SNIE100-11-58, 第一页和第二页, 1958年九月十六日.
- 注41: NIE13-2-60, *中共的原子能计划*, 第三页, 1969年十二月十三日.
- 注42: NIE13-8-67, 前引书, 第三页.
- 注43: 同上, 第十三页.
- 注44: NIE11/13-6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国*, 第七页, 1969年八月十二日.
- 注45: NIE13-8-74, *中国的战略攻击计划*, 第三页.
- 注46: 同上, 这些数量在情报界引起争论, 海军和空军对中国未来武器发展方面的数量估计提出脚注.
- 注47: ORE45-48, *中国目前的局势*, 第二页, 1948年六月二十二日.
- 注48: ORE77-48, *中共控制全中国的能力*,
第三页和第八页, 1948年十二月十二日, 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 注49: 参阅NIE58,
中共政权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关系: 目前的性质与未来的可能方向,
第二页到第五页, 1952年九月十日.
- 注50: 参阅, 如包华德, 亚利山大·艾克斯坦, 菲利普·莫斯利, 本杰明·史华兹的 *莫斯科与北京的轴线: 强大和紧张之处*,
(纽约, 哈伯特兄弟出版社1957年出版), 以及W. W. 罗斯托的 *中共的前景*
(麻省, 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理工出版社1954年出版), 尤其参阅第四章.
- 注51: 如欲阅读有关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决裂的全部分析文章之极佳的概述, 包括本汇编所收录的评估文件, 参阅刊载于1998年至1999年冬天的 *情报研究*,
哈罗德·福特的 *识别中苏决裂*,
该文可在http://www.cia.gov/csi/studies/winter98_99/art05.html 查阅.
- 注52: NIE100-3-60, *中苏关系*,
第十四页, 1960年八月九日. 当时有些学术界的认为国内政治与中苏决裂有更直接的关系. 参阅, 如唐纳德·柴哥利亚的 *中苏冲突: 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威廉·格里菲思的 *中苏决裂*
(麻省, 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4年出版), 以及戴维·弗洛伊德的 *毛对赫鲁晓夫: 中苏冲突的简史*(纽约: 普瑞爵1964年出版)
- 注53: NIE11/12-66, *中苏关系的展望*, 第一页和第二页, 1966年十二月一日.

注54: NIE11/13-69, 前引书, 第一页和第八页.

注55: 同上, 第十页. 如欲阅读有关苏边界冲突对尼克松政府关于中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和北越之战略思维所造成的影响的揣测性的, 有趣的报道, 参阅邵培德的一道长城: 六位总统与中国--

调查性历史(纽约: 公共事务出版社1999年出版), 第六十一页到六十九页.

注56: 中国外交部有关周与科锡金的会晤的报道可在<http://www.fmprc.gov.cn/eng/ziliao/3602/3604/t18005.htm>查阅; 有关中国试验的信息可从<http://fas.org/nuke/guide/china/nuke/tests.htm>取阅.

注57: NIE11/13/6-73, *中苏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变化*, 1973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58: NIE10, 前引书, 第二页.

注59: NIE13-60, 前引书, 第二页.

注60: NIE13-9-65, *中共的外交政策*, 第一页, 1965年五月五日.

注61: NIE13-69, *中共与亚洲*, 第六页和第七页, 1969年三月六日.

注62: ORE45-48, *中国目前的局势*, 于1948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注63: 参阅*美国的对外关系, 1948年, 第七卷, 远东: 中国*, 第118页到第154页.

注64: ORE77-48, *中共控制全中国的能力*, 1948年十二月十日.

注65: 邹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50*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第466页.

注63: SNIE100-9-58, 前引书, 第五页和第六页.